

中国精神系列

中国的世界精神

徐复观国际时评集



徐复观 著

姚大力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世界精神

中国与世界精神关系研究



中国与世界精神关系研究

中国与世界精神关系研究

中国与世界精神关系研究

中国精神系列

中国的世界精神

徐复观国际时评集

徐复观 著

姚大力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世界精神：徐复观国际时评集/徐复观著；姚大力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2
ISBN 7-5617-3566-9

I. 中... II. ①徐... ②姚... III. 国际政治-文集 IV.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783 号

中国的世界精神

徐复观国际时评集

著者 徐复观
编者 姚大力
策划组稿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长华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江苏省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6 开
印张 17
字数 241 千字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一次
印数 5 100
书号 ISBN 7-5617-3566-9/K·238
定价 25.5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良心照察下的国际政治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也就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在上述三十年中,徐复观的个人生活经历了几度曲折转变:先是脱离国民党官场而尝试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主办某政论杂志,四五年后终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教学、探讨,到1969年又因故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移居香港而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与这番“漫长而艰苦地研究历程”^①相始终,他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及其方圆以外整个人间世界的重大动向或事件。因此,三十年里,除了等身的学术专著,他还断断续续地撰写出数量巨大的时评类杂文;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以国际政治为话题。

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或许部分地与“稻粮谋”有一点关系。特别是在香港的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靠这些杂文和刊出这些杂文后面的友谊来维持生活”。然而,驱使他欲罢不能地无法忘情于杂文创作的最重要动力,还是来源于以超乎一己之私的情怀去切入人世、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儒家生态度。他说,是“我的良心”在压迫着他“不能不写”。因此,在香港,“每星期七天,五天时间我是面对古人。一天半或两天我又面对当代。这种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今在生活中的循环变换,都来自我们国家的遭遇对我所加的鞭策”^②。这样的心境,往往更直接而明确地透露在他的诸多杂文之中,其程度要远远超过它们在更加专门化的学术论著之中所获得的表达。

① 语见徐复观:《杂文自序》,见《徐复观杂文》,“时报书系”241,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

② 同上注。

我们都知道,有关国际政治的时事评论,就像新闻一样,它的生命力经常与最强烈的时效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今的读者在披阅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时,是否会产生某种“恍若隔世”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甚至具有双重的性质:因为不仅这些杂文的写作年代距今多已长达三四十一年之久,而且它们整个地属于那个特定的“冷战”时代,亦即从二次大战后开始的、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轴心的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对峙和敌视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在如何看待1990年代以往的国际政治格局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冷战”的终结无论如何总已是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项共识。既然如此,现在推出这样一本书,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桩过时的举动?

我们也知道,国际政治学作为极具实践性、因而在各国都受到政府和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显学”,本是一个涵盖面很广泛的庞大知识领域。不同的国际政治学家可能聚焦于不同的重大国际问题,从而将这个庞大领域进一步分割成许多高度专门化的学术分野,诸如外交与国际法,武力裁减、防止核扩散和国际关系中的武力使用,国际合作组织和国际体制,生态、自然资源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中的人权与正义原则等等。当然,学者们还会按照他们所服膺的不同学术流派所主张的不同理论预设,或它们切入问题的不同视角,去阐释国际政治中的种种事件与现象。虽然在今天,流派纷呈的当代国际关系论坛显现出比往日更为动态、更加多元化、更错综复杂的面貌,^①但是那五花八门的理论主张,其实大多数在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现身了。徐复观虽曾在某个农业院校里讲授过“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这样一门课,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家;他对国际政治的思考评论,似乎也不曾与当日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见解可以说是“非专业”的。

① 例如“后经典现实主义”学说就在近十年里崛起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内部,并向冷战时期长时间地在西方学术界居支配地位的新现实主义传统提出有力的挑战。而各种自由主义的理论,包括强调相互依赖共存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乃至民主自由主义学派等,也都在“后冷战时期”变得异常活跃;民主自由学派的迈克尔·多伊勒甚至大胆地预言,自由民主化在全球的胜利将发生在2050至2100年之间。参见S·G·布鲁克斯:《争论中的现实主义各学派》,《国际组织》卷51·3(1997);S·M·瓦尔特:《国际关系:一个世界,多种理论》,《外交政策》,1998年春季号。后一篇论文概括地讨论了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主要范式及其在后冷战时代的新演变,尤可参阅。

我们同样知道,在他的最后三十年里,徐复观从一个“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人,成就为著作丰富的“儒学思想家”,成为熊十力之后与唐君毅、牟宗三并列的现代新儒家阵线中的代表性学者。^① 不难推想,徐复观的国际政治观,亦以儒家传统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问题恰恰在于,传统儒家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天下中国观”作为核心,中国不但是天下的中心所在,而且简直就是天下唯一的国家。对世界秩序作如是想像,既然阻抑了与均衡的多国体系有关的各种观念、制度的发育和成长,在儒家传统中因而也就难以发展出对国际政治的必要意识以及相关的知识技术体系^②。就国际政治问题而言,儒家思想充其量不过是一脉“贫矿”。所以,凭藉儒家传统议论国际政治,对常人来说,难免会产生以尺短之绌奋臆遽谈的畏忌。

然而,令人吃惊、更令人深为佩服的是,事过境迁数十年,回头来阅读徐复观所写的那些多半属于即兴式、随感式的国际评论,我们发现它们竟然完全超越了上面提到的种种看来很难规避的客观限制,而使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强烈地体认到一个处于失望之中、却始终未曾失望的智者对他那个时代的思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洞见、关怀与虎虎生气,并使人深深地为之感动。

成都“武侯祠”里有一副著名的对联,上联的最后一句写道:“自古知兵非好战”。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不见得是国际政治圈内的专门者写得出来的。它们更贴近一般人们的思想和理解方式,却又以其底于平实而极乎高远

① 徐复观在《旧梦·明天》一文中为自己的墓碑预拟了一则三十字题铭:“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儒学思想家”的定评,见杜维明:《徐复观先生的胸怀:为纪念一位体现忧患意识的儒学思想家而作》,《中国时报》,1983年5月1日。关于徐复观在现代新儒家传统中的地位,见余英时:《血泪凝成真精神》,《中国时报》,1982年4月2日。

② 以“天下中国观”为核心的儒家世界秩序观念,通过两种方式来协调自身形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不一致。一是将相对独立乃至完全独立的国家或地区边缘化。为中央王朝的权威辐射体系所笼罩的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即由国家编民所组成的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以及“朝贡”地区。后者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被纳入中央王朝官职体系、由中央王朝行使间接统治权的“羁縻—土官”地区;二、履行朝贡义务、但不接受中央王朝官职委任的国家或地区;三、只有互市、而与中国没有任何臣属关系,但也被看作属于“朝贡”体系的国家或地区。在这样的世界结构中,尽管中央王朝的控制力随上述三个层次的空间转移而逐次递减而至于零,但在观念上它仍然被认为是覆盖了全部已知世界的。二是将汉文明核心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次分裂看作只是统一国家衰败时的不正常局面和下一次统一的孕育期。而分裂时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于是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成了为实现“中国”内部的统一而进行的征服和统治的关系。因此,古代中国分裂时期存在于操作层面上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惯例、规则和外交实践,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它们似乎完全没有触动意识形态层面上儒家的世界秩序观。

世界历史

的睿智引导读者去超越常识(但绝不违背常理)。我想,也许这就是本书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西方国际法的奠基者H·格罗梯乌曾将他于1625年出版的《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一书献给法王路易第八;他宣称:“因本书乃以正义的名义写成。”我们不应怀疑,格罗梯乌这句话至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真诚和理想成分;但我们同样也无法怀疑,国际体系中以强凌弱、以冲突与勾结互相推动的“无秩序”性质,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某一方滥用强力的最可靠制约,只能是对立的那一方手里旗鼓相当的实力。在有些至关重要历史关头,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甚至使人无所适从。R·阿隆说过,如果法国在1933年采纳皮尔苏兹基元帅用武力推翻希特勒的主张,那么它无疑是违反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侵犯了德国人民自由地选择国家制度和领袖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就永远不可能知道,此举将可以使人类避免何等巨大而持久的灾难。阿隆接着写道:“现在对这段还不能算已经完全过去的历史进行带反讽意味的评论,我并不想暗示其中存在的道德问题,而是为了指明国家间关系之真实性质的某些后果。由于各国至今坚持将法律操纵在自己手里,并且只是从他们自身的荣誉出发考量形势,因此最终地分析起来,国家的生存只能依赖于各国实力的均势,而政治家的职责所在,则是将那个以命运托付斯人的国家置于最首要的考虑。国家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是从支配着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家们所谓的‘自然状态’中逻辑地派生出来的。”^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乎半个世纪里,世界政治格局中强国均势的最基本的历史特征,就是它从战前由五六个大国支配世界的多极体系转变为由美苏二霸担纲的两极均势。但自1960年代末期以往,这幅过分简单的“均势图”越来越难以体现国际政治的复杂情状。因此,徐复观在1970年代的第一年便在他的时评中提出,以美、苏、中的“三角关系为主的国际政治”时代正在到来。^②

在他看来,这种变化是由几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一是美国在“越南战争

^① R·阿隆:《和平与战争:一种国际关系的理论》,R·霍华德和A·B·弗克斯的英译本,纽约:弗里德里克·A·珀莱杰出版社,1968,页580。

^② 见徐复观:《七十年代的国际三角关系》,已收入本书。

综合征”(以及稍后发生的1970年代前期西方经济全面滑坡)的影响下显示出一派衰相,导致它在国际问题上的“软化”。当日的中国人甚至用这样一个生动比喻来形容他们想像中的美国国势:“大船破了,还有两担钉”。其二,上述形势当然使苏联在美苏对峙中渐趋上风。“从去年(引者按、此指1968年)八月出兵侵占捷克为一明显标志,苏联在东欧,在中东,在地中海,在南、北非,在远东,在印度洋,在大西洋、太平洋,不是为所欲为,便是步步进逼;……可以说,苏联占尽了便宜,美国吃尽了苦头。”^①其三,从中苏分歧的公开化直到双方在边境以兵戎相见,又表明“共产主义阵营”非但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国际角逐的基线”,正在从苏、美对抗滑向中、苏对抗。因为这样的形势,中国被“在国际行情中估计得日益强大”;而美国则力图利用中、苏、美的三角关系,重新争取在均势中的主导地位。徐复观写道,尽管美国官方几次三番地公开表白“无意用中、苏冲突以取利。……但中国人熟悉庄子‘以无用为用’的思想,所以立刻了解到美国人所说的不用,正是想利用”。“西和东紧”的局势使中美关系的缓和成为势所必然:在他作出这样预言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开展“以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毛主席在即将发表的著名的“五·二〇”谈话中,仍将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徐复观的看法显然不能说是没有眼光的。

在徐复观标揭“三角关系”论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外交所推行的,是一条“第三世界路线”^②。这条路线的基本战略,是竭力促成“七处冒烟,八处点火”的世界革命形势,将毫不妥协地站在反对“美帝苏修”两霸立场上的中国看作是代表着人类进步的责无旁贷的时代中坚。和“第三世界路线”相比较,“三角

① 徐复观:《美国世界战略的转换》,原载《华侨日报》,1969年9月26日。在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整个冷战后期,恐苏症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国际思潮。虽然有些学者,如强调国际权势均衡的新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斯·华尔兹,在1980年代业已指出,苏联正在走向退坡;但它没有能阻止上述思潮的流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就曾宣称,“他们(指苏联——引者)已经全方位地超过了我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中国在那时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列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并且因此而寻求与美国的缓和;这也部分地与上述思潮有关。

② P·V·奈斯指出,在共和国的前四十年中,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的身份认同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将自己定位为既属于第三世界,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社会主义路线”时期(1949年至1957年),“第三世界路线”时期(1960年至1970年),以及“现代化和向西方开放的路线”时期(1978年起)。见他的论文《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外交政策与官方的民族国家认同》,载狄默尔和金主编:《中国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1。

关系”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价值定位自然有巨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对中国在国际均势中的分量估计却颇有一致之处,即把中国视为决定全球战略局势的三大主角之一。

很可能与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人们一样,徐复观当时大概无法知道,中国经济那时候已经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响亮口号下逐渐走近“崩溃的边缘”。即便如此,中国的地位还是被他估价得过高了。他的“三角关系”论,很大程度上来自基辛格。但基辛格对当日国际局势的见解似乎还没有如此偏颇。他说,从军事意义上说,仍然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在经济方面,则要加上日本和西欧;在政治方面,则还必须把中国算进去,——但他又急忙补充说,中国与其他大国,“仍然有巨大的差别”。基辛格在阐述“军事上两极而政治上多极”的国际格局时,总是不忘记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包含中国)并提。^①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复观如此看重“三角关系”的意义呢?

我想,在徐复观对当日局势的看法里,有一个观念一直导致着他思想深处不由自主地紧张和忧患:这就是在当时看来势力已压过美国的苏联在与西方缓和的同时,正加紧准备“中、苏对决”。1969年夏天,他写道:当前苏联的世界战略,是钳制美国,稳住美国,进一步把中国以外的亚洲诸国组成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包围圈,最后达到解决中国的目的。同年底,他又写道:“苏联多方面的外交活动的目的,只集中在一点,即是对中共要使用军事的闪击战加以重点地摧毁,要使在外交的部署上用安排‘金锁锁金龙’的方式把中共困死”。^②因此他以为,遏制苏联扩张不但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共同利益,而且也是中国摆脱这一凶险的最好选择。

从徐复观的政治立场来说,他原本或许并不喜欢看到中美关系的缓和。但当他面对苏联“对新疆的土地与铀矿的获得,及在大陆上树立一个傀儡政权的野心”^③时,徐复观毫不犹豫地表示,“只要是中国人”,就只能有一种共同的立足点,“即是维护自己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在这种地方,不应当有两

^① 见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载《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汉六连译本,上海,1973;《基辛格抵莫斯科》(法新社华盛顿电),载1973年5月6日《参考消息》。

^② 见《苏联当前的世界战略》,原载《华侨日报》1969年7月21日;《岁尾年头看世局》,原载《华侨日报》,1969年12月30日。

^③ 《美国世界战略的转换》。

种看法”。在后来的中越战争爆发时，他又写道：“我想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对国内政治问题的意见，是对立得如何尖锐，但我深信，这类关系国家民族千百年利害荣辱的对外战争，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勇敢接受的最基本的考验。”^①对1976年末苏联与中国的和解表示，他同样写道：“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认定，假使苏联有和解的诚意，必须把驻在外蒙的苏军完全撤出。”^②看来，对中国面临外来威胁的命运安危的严重关切，使徐复观“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而超越了意识形态对立的限制。他说过：“站在人的立场，不能不讲良心。站在国家的立场，不能不计利害。”^③他的“三角关系”论，似乎并不完全是从国际均势的观照中推导出来的，而且也反映出他情不由衷的爱国之心。十分可能，正是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发自内心的关切，使他在无意之间就放大了“三角关系”在当日国际政治中的意义。

诚然，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任何一个有现实意识和负责态度的人，都无法回避如下的问题，即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去推动和巩固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国家正当利益的权势均衡。尽管如此，徐复观没有因此陷入阿隆所谓“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把保持对自己有利的战略均势看作国际政治中压倒一切的目标。1971年，孟加拉国建立。它的建国运动受到当时与巴基斯坦相敌对的印度的支持；而印度的背后则是苏联。因此巴基斯坦对东部领土统治权的瓦解，意味着苏联势力在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地区的扩张。这是徐复观所不愿看到的。但他并没有被“均势”的迷魂汤灌得六神无主。他虽“一向是反对苏联的野心和手段的”，但这次却明确表示，若站在是否尊重孟加拉人民意愿的立场上看问题，则苏联的态度较之美国“实在有更多的说服力”^④。难能可贵的是，“两大阵营”对峙的严重局势和利害算计，没有动摇他对“人民决定一切”这一原则的坚定信念。

推动或调整国际均势的结构，必须采纳正当的手段。在这方面，徐复观原则上不同意那种机诈式的“外交奇招”。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年间曾是“纵横家”

① 《终于要打这一仗》，原载《华侨日报》1979年2月19日。

② 《一九七三年的待望》，原载《华侨日报》1973年1月3日；《苏联“有限主权论”的扩张与贯彻》，原载《华侨日报》1976年11月3日。

③ 《以色列人应放弃“冤冤相报”的观念》，原载《华侨日报》1974年5月23日。

④ 《人民决定一切：印、巴之战应有的归趋》，《华侨日报》1971年12月16日。

逞雄天下的时代。那时候,“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左右倾侧,……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①。但对战国以“波谲云诡”的诈术代替春秋时尊礼重信的时代风气,徐复观一无好感。1970年代出现了一位轰动一时的现代纵横家,就是先后做过尼克松和福特这两个美国总统的国务卿、以擅长“高峰秘密外交”著称的基辛格。同样地,徐复观对他也不欣赏。他称他为“西方鬼谷子”,称他是“机灵的大滑头”,说他呈现了一副“机巧变诈的形象”、“赌轮盘的大亨的形象”^②。从一次大战以来,秘密外交的批评者一向指责它是“叛卖的帮凶”,是在各国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它的人民之间导致不确定关系和误解的根源。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现实,使各国至今还只能在“公开缔约,秘密达成”的共识性限制下,有条件地允许这种“必要的罪恶”继续存在。徐复观没有一概地反对秘密外交。他也承认美国当初对自己的外交战略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乃有“不得不然”的历史理由。但他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们“以闪电的方式”,“在一眨眼之间”,“在事先没有半丝半毫的朕兆”的情况下,便公然违背自己从前的盟约与承诺。他因此将这种手腕称为“尼克松外交的污点”。他说:“尼克松是有些外交手法的,但手法太高明之处,即是他的污点所在。”^③

不幸而被他言中。在徐复观批评尼克松“手法太高明之处,即是他的污点所在”后不久,便发生了有名的“水门窃听”事件;又一年后,这桩丑闻东窗事发,引起“白宫的大地震”。结局是尼克松被迫辞职。虽然最终导致他栽跟斗的不是“外交的污点”,但那“污点”的根源却是相同的,即以施行诈术为高明,结果反而为聪明所累。有人说,“水门事件”不过是后台政治中的家常戏,尼克松只是稍欠运气而已。这等于是说,因为人类社会做不到杜绝偷盗,所以就不应当惩治偷盗,甚至视惩治偷盗的主张为“幼稚”。徐复观对这种以玩世不恭为深刻的立场不以为然。所以他说:“道德没有什么形而上学,只是在诚实的生活上立基。”所以他会感叹地问道:“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出现水门事件?”^④

对尼克松“外交奇招”的批评,应该带有某种程度的切肤之痛。但同时,它

① 刘向:《战国策》书录。文中“横”、“从”(即“纵”),分别意谓连横、合纵之策的成功。

② 《国际政治上日本又迎到了一阵神风吗?》,已收入本书;《美国国际政治形象的重建》,原载《华侨日报》1975年6月15日。

③ 《尼克松外交的污点》,已收入本书。

④ 《美国政治的梦魇》,原载《华侨日报》;《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出现水门事件?》,已收入本书。

也完全符合徐复观所信奉的人类政治中的根本价值。

这种根本的价值,就是以仁爱为内容的道德自觉;徐复观在不少场合直接叫它作“良心”。他说:“‘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无间于中外,而可当下加以证验的”。“顺着良心所发出的简单平易的良知良能,永远是人类向前生存,向上发展的基点。真正伟大地事功,都必须由此一基点伸展上去”。良心使人们能够超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信仰,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汇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良心可以成为真信仰的见证:“人只有在良心上超越了他的信仰,才可以证明他所信仰的是上帝。良心的隐退,即是上帝的隐退;于是而始有各种不同信仰的斗争、排斥。”因此,走出冷战的根本途径,在于仁爱精神和良心的发扬。^①徐复观指出,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显示出它独特的优越性。

他认为,在西方,对道德的价值体认最深的,莫过于康德。“但康德必须用二律背反的方法,费这大的思辨力量,以证明道德理性的存在。这是说明西方文化的习性,不把人当下可以验证的道德事实加以承认而肯定其价值;……于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不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其应有之价值地位,……致使人性中最宝贵的这一部分,被抑压泯没,不复在人生社会中发生应有的作用。”^②中国文化却是“在具体生命上立脚的文化;是在具体生命与具体生命之间,直接晤面的文化;……以具体生命的自我完成为目的”^③。所以儒家文化“抓住人心当下一念所自然呈现出来的不忍人之心,亦即是仁爱之心,确定其为人生根本价值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儒家总是能够把中国人的感情,在紧要关头“从直接的利害中推扩出去,从仇恨中转出伟大的爱来”^④。徐复观把这种“伟大的爱”看作人类希望的根本之所在。

理想主义的色彩,就这样弥散、穿透在他的全部国际时评中。东西方的“鬼谷子”们尽可以自以为深刻地讥诮徐复观说:“你何曾看见过有什么‘理想’能真正地在国际政治中落实?”但这样的诘难不过暴露出诘难者自身极其肤浅

^① 见《当前思想家的任务》,《一个中国人读尼克逊的就职演说》,《上帝、良心、南越》。均已收入本书。

^②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③ 《在日本暴力主义的背后》,已收入本书。

^④ 《何应钦在日本》,原载《华侨日报》1951年5月4日,署名司托噶。

书
国
语
时
洲
家
著

的深刻、或曰极其深刻的肤浅而已。一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很难做得到以理想为唯一的行事准则。但理想是远方的地平线。它不即不离地指引、鼓舞着人们朝前走,从而使人和人类社会能不断地获得提升。相形之下,徐复观的“天真”比鬼谷子们的自以为是还要深刻得多、宝贵得多。他的答复,其实也早已经写进了他的评论。他说:“把问题摆在时间的平面上看,良心似乎无凭而更无力。但把问题拉长在历史之流中去看,则良心是可凭而又是有力的。”^①

以良心为道德内容,以当下、直接的照察和判断来紧扣良心、印证良心。很明显,这样的理想主义主张,是以宋明新儒家作为思想资源的。不过,徐复观立基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又超出了宋明新儒学的时代限制。在他看来,人类在现代环境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法则,集中地反映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政府行为来调整自由经济下财富及其他生活资源分配的社会主义这样三种重要的制度体系之中。关于三者能否从中国本土的传统中独立生成并发展起来,理论家们可能还会继续争论一百年。徐复观的视角,则是要为它们在当代中国实现成功的重建,而在中国传统中开发出为制度衔接所必须的本土资源。以这样的逻辑去理解徐复观,我们才能懂得,例如关于民主政治,为什么他有时候说中国文化精神是“可真正培植民主自由的基础”,有时候又说儒家没有构建出与实现民主政治的目的“相适应的手段”,甚至把这一点看作是“东方人的良心呈现所受的最大的限制”、中国文化中“最大的污点”^②。他的基本见解其实是一贯的,其中本不存在什么摇摆或恍惚不定。

所以,笼统地用“新儒学”来界定徐复观的国际政治观,是很容易导致误解的。学术界现在有一种见解,把现代新儒学称为“新的儒学”(New Confucianism),以便将它与专指宋明理学的“新一儒学”(Neo-Confucianism)区别开来。主张在现代制度环境中去推展儒家文化,这是以徐复观作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立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徐复观所阐扬的“中国的世界精神”,即是现代新儒家的“世界精神”。

现代新儒家的世界精神,与国际关系理论中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标帜的

^① 《良心、政治、东方人》,已收入本书。

^② 见《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南韩今后的道路》,《良心·政治·东方人》,《美国水门事件的归结》。均已收入本书。

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见解颇有相近之处。二者都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都把政治民主的扩大看作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都把各国的国内政治看作是与国际层面上权势与利益争夺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国际政治活动及国际关系变化的动力。徐复观说，凡属重大的政治决策，往往无国际、国内之分，这一点“却容易为人所忽略。一个国家，内政所要求的，常常形成国际政治活动的方针。而国际政治的大势，也常常反转来，决定内政各种发展的方向”^①。对各国国内的重大事变和社会文化的思考，因而也就构成了他观照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局的变化实在不容易穷尽。在掂量各国的国内政治时，徐复观想守住的，是一种“直指人心”式的根本尺度，就是看它们是否贴近大多数国民的意志。不少政治家把民意看作是可以操纵、玩弄甚或劫夺的东西。徐复观则与这样的人截然不同，他对民意抱有极大的敬畏之心。他说，“人民的命运，必须操在人民自己手上；人民的错误，让人民自己去修正，这是较之任何‘代天行道’的政治观念和组织形式，更能给人类以安全感”。其实，所谓“理义”，并不是什么高深不可测的东西，所以也本不必非由某些先知先觉者来传授给人民。“多数人的好恶之情即通于理，多数人的利即通于义。所以多数人的自身，即是情与理、义与利之间的结果。”^②

徐复观对人民意志的见解有两个强调点，一是他认定大多数人的判断，在大是大非上一定可以成立，所以是不应该违反的。他肯定儒家关于人民“愚而神”的看法：“从知识分子的知识水准来说，人民是愚。但对于大是大非，大利大害的判断能力，人民反常在知识分子之上。……所以儒家便认定人民由是非利害的判断而来的好恶，是可以信任的”^③。二是他坚持人民是具体的，由每一个不可忽视的个体所构成。他对以下那种高论持强烈的抵斥立场，即认为“个体不过是全体的符号；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价值是在作为实体的全体”。如果以“人民”这个“不可捉摸的全体”作为名义，去否定个体的自由意志及其现实存在，其结果必定走向对真实意义上人民的否定。^④ 这样政治要维持下

① 《在和平中战斗：对国际局势之一探索》，原载《微信新闻报》1964年1月1日。

② 《自由主义的变种》，原载《华侨日报》1964年5月23日、25日。《民主政治的另一角度：情理义利之间》，原载《华侨日报》1974年9月17日。

③ 《苏特在葡国的策划，启示了我们些什么》，原载《华侨日报》1975年7月22日。

④ 《共产主义的危机：论苏俄政变》，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5年2月22日。

去,需要靠镇压和以镇压相威胁,同时也要靠欺骗来愚民。在评论“苏联特务”在葡萄牙搬弄的“现代愚民经”时,徐复观写道:“现代愚民的方法,第一是不要人民知道统治者的内情及世界各国比较完整的情况。第二是夸张歪曲一套一套的半虚伪乃至全虚伪故事。第三是对问题,对资料,不作客观性的解释。第四是在价值判断上,不能留有可资比较、选择的隙缝。因此,必然要采用彻底垄断传播机构的手段。”^①

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徐复观认为,人民欲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追求自由与平等这两大价值、两大目标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自由的基础上,发展出民主政治。近代民主政治下的资本集中和贫富悬殊的不平,便激发出社会主义。在徐复观眼里,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同样是“人类智慧所提出的人道主义的巨大里程碑”。因此,他将欧洲政治的走向定义为“民主社会主义”;它是在保持民主政治“主体性”的前提下,“在民主体制运行之下实行社会主义”。他预言:这“是当前的一个事实,也是未来的一种希望”^②。他一直在提倡“中道的政治”。现在我们明白,他所谓“中道”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民主和自由之间的“中道”。

值得注意的是,徐复观写下这些见解时,冷战还远远未曾结束,也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它在不太久的将来居然就会结束。纵观世局的前瞻能力,有时并不来源于秘密情报的掌握、与高层人物密切交往的特权、一大堆技术性的知识,或者诸如此类的因素。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信去固守良心照察之下带根本性的是非原则,这样做看起来有点像是迂阔。而徐复观在思考国际政治时表现出来的前瞻性,似乎恰恰是来自他的此种迂阔。

凭借着良心照察下的大是大非原则,徐复观对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决策与实施、重大事件、社会文化现象乃至政治活动家个人,作出了代表他个人立场的批评甚至抨击。毫无疑问,他的言论,也不都是无可商榷的。例如1969年,韩国政府宣布从下一年度起全面废止韩文中保留的汉字,包括原先列入中小学教育的六百个基本汉字在内。从韩国后来又部分地恢复了韩文中的汉字使用(特别是在标题、专用名词的范围内)来看,徐复观对骤然之间欲全

① 《苏特在葡国的策划,启示了我们些什么》。

② 《略谈民主社会主义》,已收入本书。

面废除汉字的决策持批评态度,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文化基本问题的解决,总当行之以渐,积之以时。以政治强制之力,行之于一旦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怀疑的。”^①这个结论也完全值得引起人们深思。问题在于,至少是在行文中间,他对“文”(语言的书写系统)和“字”(语言书写系统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不同概念完全不加以区别。韩文与日文中的汉字符号已经分别地融合为韩文和日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已经是与“汉文”根本不相同的概念。徐复观反问道:“为什么不可以把汉文当作中、韩、日三国的共同文字,而依然要视为‘外来语’?”对此,我们的回答断然应当是:“当然不可以!”从客观效果上说,他的这个见解带有汉民族沙文主义倾向,虽然这未必是他的本意。另外,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徐复观把韩国政府的上述决策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这也是十分不妥当的。

那么,他在国际政治方面写就的大量批评性文字,是否会有“干涉别国内政”之嫌呢?我们的回答仍断然应当是:“当然是不会的”!

人们对国家主权绝对性的认识,近十多年来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②但是无论如何,主权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参与国际政治的最基本角色。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政府要员随便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当然可能引起邻人的不快甚至抗议。但是一般个人的言论与政府立场无关。政府本不必、也

① 《韩国的文化大革命》,已收入本书。

② 国际政治学从不止一个角度提出对国家主权绝对论的怀疑。里因尼克在他的《全球公共政策:不经由政府的管理是可能的吗?》(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1998)一书里提出,自196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互相依存的长时期量变趋势,已经在1980年代后期质变为真正全球化过程。全球化并不挑战以领土完整为基础、而由国家边界来标志的“外在主权”,但它确实削弱政府的“内在主权”,即政府在国家疆域内决定其公共政策的权力。另一种看法认为,国家主权在不少场合会蜕变为某种偶像崇拜的形式,成为对内实行残暴和不公正统治的政府回避合法的外部监察的挡箭牌。冷战结束以来,这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也有持相反意见的)。在绝对主权论的动摇方面,有两类极其显著的例证。一个是欧洲共同体的成长;另一类则是以人权为理由、未经当事国同意而实施的在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索马里、卢旺达、海地、柬埔寨、利比亚等地的军事性国际干预,这类行动按从前的观念,恐怕就要被看作是对当事国主权的侵犯了。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主权”条,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需要指出,美英等国出兵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性质与以上两类情况又有所不同。这似乎是对阿隆“带反讽意味的评论”(见上引)所作出的一种未必吉祥的回应。如果几个强国能任凭自己的意志,以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决策都是“超国家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为由,用战争去“确保”别国国内决策的“民主通道”,如果国际社会竟可以允许“先惩治,后取证”的做法,那么,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演变成对人类的一种新的奴役?“温和的霸权”(the benign hegemony)是万万靠不住的。